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创建新政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创建新政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六卷 创建新政

主 编：田克勤 刘国新

副主编：刘 敏 叶卫东

编 者：管路燕 董 研 张珊珊 杨建辉 李福秀
孙殿春 高亚楠 李国成 阚洪宇 庞广滨
李东生 许云松 王文龙 刘孝芳 张敬民
王 超 董 斌 田 野 王际波 朱梦超
刘忠祥 田 军 段永利 张 垒 宋岩瑞
代 沐 王晓林 张 辉 马立志 王 刚
张春城 陈富永 范玉亮 王学军 张少男
周金凤 塔 鑫 李江宁 韩作友 彭 鹏
李 忠 裴清植 蒋晓林 姜国军 王欣峰
李伟琦 宋晓彬 吴晓红 梅林生 姜岩武
熊长明 李大红 华天阳 范维生 王晓平
于海生 夏 琰

统 稿：王炳林 杜 军

目 录

第一章 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时的国内国际条件	(001)
新政协筹备会议	(005)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014)
人民共和国方案的形成	(019)
人民政权和人民团体的壮大和统一	(0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032)
《共同纲领》	(039)
开国大典	(053)
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060)
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067)

第二章 新政权的巩固

建国初期的国内形势和主要任务	(073)
刘邓挥师进西南	(078)
川康的和平解放	(087)
昌都战役与阿沛·阿旺晋美率部起义	(093)
卢汉策划和发动云南起义	(100)
解放海南岛	(105)
反对封锁禁运的斗争	(111)
攻克厦门血染金门	(119)
西藏和平解放	(130)
各级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	(135)
民族区域自治	(142)
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	(149)

第三章 开展三大运动

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势力	(163)
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及方法	(173)
没收官僚资本的情况及意义	(182)
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188)
禁娼妓禁毒品取缔反动会道门	(194)
稳定物价的斗争 打击投机资本	(202)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成立	(212)
合理调整工商业	(219)
建国前后的货币统一	(229)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	(234)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总任务	(242)
建国初期的重点建设工程	(247)
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2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制定	(257)
土地改革运动	(269)
国营工矿交通企业中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275)
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	(279)
镇反的反思	(287)
1955 年内部肃反运动	(293)
潘杨事件	(300)
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	(304)
朝鲜战争的五次战役	(310)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及其历史意义	(326)
朝鲜战争期间的台湾问题	(331)
中国空军在朝鲜战场上亮相	(338)
《婚姻法》的实施, 婚姻制度改革	(345)
国家机构的整编和精简	(35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建立	(356)
军衔制度	(361)
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	(369)

全军大规模的授勋	(377)
55 式军服	(394)

第四章 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

“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	(400)
农业生产的恢复	(407)
水利、交通运输的建设（建国初期的重点建设）	(411)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417)
国营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423)
“三反”运动	(429)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437)
“五反”运动	(441)
1949 ~ 1952 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时所取得的成就	(449)
1949 ~ 1952 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时期新因素的增长	(457)
1949 ~ 1952 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有益启示	(463)

第五章 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新中国文化教育方针的制定毛泽东确立新中国文化基调	(470)
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	(474)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481)
电影《武训传》风波	(488)
爱国卫生运动	(494)

第六章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	(498)
整党和整风	(502)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509)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	(513)
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	(519)
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	(523)

第七章 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实施和成就	(528)
国防现代化建设	(535)
毛泽东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为生产服务	(544)
由强调照顾小农经济特点到批评“言不及义”	(560)

第八章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	(570)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575)
总路线与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	(583)
贯彻总路线的宣传和动员	(588)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592)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步展开	(597)
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601)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605)
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互助合作会议	(610)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615)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619)
过渡时期有两个联盟	(624)
工商界学习总路线	(628)
毛泽东的生产力“暴动”论和“停缩发”方针	(632)
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加快	(637)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642)
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形成	(647)
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652)
综合平稳中前进	(656)
《论十大关系》发表	(660)
城乡社会主义改造	(665)
新中国税制的实行	(669)
清除匪盗改造社会主义游民	(674)

第九章 对文艺界的批判和“双百”的方针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678)
对俞平伯《红楼梦》的批判	(682)
胡风事件始末	(686)
对胡适及其思想的批判	(690)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	(694)
对马寅初人口论的错误批判	(699)
文艺界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	(703)
人民群众的文学艺术	(708)
教育系统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	(712)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	(717)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721)
“五朵金花”的争论	(726)
文字改革	(730)
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及侨务工作的开展	(735)
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	(740)

第十章 国防事业与对外交往的新发展

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任务	(745)
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749)
“三大制度”的实行	(754)
保家卫国的战略方针	(758)
香港与澳门	(762)
中国确立外交三大政策	(766)
中苏结盟	(770)
毛泽东访苏	(774)
建国初期与各民主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建交	(778)
伍修权在联合国的抗争	(783)
开展援越抗法斗争	(787)
中国首次亮相国际会议的舞台——日内瓦会议	(79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795)

亚非会议与万隆精神	(799)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	(803)
中印西藏问题的谈判	(808)
周恩来率团访苏	(813)
建国初年的中美关系	(818)



新中国成立时的国内国际条件

1949 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的一年。中国革命进入 1949 年以后，建立新中国的国内国际条件都已经日益成熟。首先，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前提条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历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和原则，这一理论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日益成熟。到了 1947 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被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并以此为起点，拉开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序幕。经过关键性的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体系已经崩溃，人民解放军具备了将战争推向长江以南的实力，集渡江战役、集江河进攻战、陆地追歼战、城市攻坚战为一体。从 1949 年 4 月 20 日至 6 月 2 日，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 11 个军 63 个师，43 万余人，共占了南京、杭州、上海、武汉、武昌等大城市，深入到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1949 年 4 月 23 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到 1949 年 9 月，基本解放了全国大陆。人民解放战争所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奠定了新中国成立的前提和基础。

从国内条件来看，新中国成立的基础有：

在军事上，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战略决战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关系到整个革命的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正因为如此，在三大战役中，双方均投入大量的主力精锐部队。人民解放军参加三大战役的共有 240 多万人，国民党军有 190 余万人。三大战役争夺的地区是东北的锦州、沈阳、长春一线，中原的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华北的平津地区，这些都是具有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意义的地区，因而决战的胜负就更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了。

三大战役决战的结果，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 144 个师，非正规军 29 个师，共 154 万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主力精锐兵团廖耀湘兵团、黄维兵团、邱清泉兵团、黄伯韬兵团等，内有蒋介石嫡系所谓“五大主力”

剩下的全部四个主力军：新一军、新五军、新六军、十八军。这个数目占国民党军1948年8月间的总数（365万人）的42%，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消灭殆尽。

在三大战役以前，1948年8月国民党南京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还顽固地声称：“我个人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我仍然要百折不回继续奋斗，毫不灰心，毫不气馁，我不忍放弃这剿匪（指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责任，所以我不能不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勘乱建国的使命。”但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当国民党继辽沈战役失掉47万精锐部队之后，又在淮海战场上失掉黄伯韬兵团和黄维兵团，平津战场上的数十万部队也已被分割包围成为死棋的时候，同一个蒋介石就在1949年元旦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求和”声明，要求“停战”了。而当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淮海战役，徐州战场的杜聿明集团又被全歼，平津战场的天津守敌继之全部覆没之后，蒋介石就再也不能支撑下去，1月21日宣告“因故不能视事”，被迫“引退”了。

历史的进程表明，正是因为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的100多万精锐部队，从此，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随之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总崩溃之中。

在政治上，解放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三大战役的结果，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锦、沈、长战略长廊，从而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解放了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解放了以平津为中心的东起山海关、西止张家口的大片地区，使华北全境除大同、太原、新乡、安阳等孤城外，完全获得解放。这样，从东北，到华北，到中原，到山东，到苏北、皖北，以至长江沿岸，已经完全解放并连成一片，这就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总后方。三大战役以后，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国民党的所谓“天险”长江防线及其统治的心脏地区京沪一带，就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打击之下了。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人民政权和人民团体也在日益走向壮大和统一，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首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1947年5月1日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相当于省级的民族自治区。它的建立，主要是解决了实行自治的方向问题和逐步完成被分割的区域统一问题。接着，中原，华北和东北人民政府相继成立。1949年前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党的六大中央局为依托，在全国设立了六大行政区



域，即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9月成立，不久改成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归政务院直接领导）和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军政委员会（都是1949年12月成立）。由于各地解放时间不同、地区差异较大，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省和省以下地区的条件尚不具备，因而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建立起的大行政区，有利于稳定政权，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是当时客观条件的必然要求。

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各人民团体迅速壮大和统一。1948年8月~1949年8月的一年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倡议下，全国的职工、妇女、青年、学生及文学艺术工作者，先后召开了代表大会；全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工商界人士，也先后召开了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准备成立自己的团体。

人民政权和人民团体的壮大和统一，使原来分散独立的小解放区，逐步集中统一，在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上积累了初步经验，培养了大批干部，这就为建立全国性的政权作了重要的准备。

在方针政策上，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报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七届二中全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为迅速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两极格局下的国际形势来看新中国成立的基础。

1947年，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世界逐渐形成了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何去何从，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必须要做出抉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审时度势，高瞻远

瞩，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做出了中苏结盟，导向社会主义阵营一方的外交决策，这既是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的一种选择，更是巩固新政权，建设新国家的现实需要。

苏联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苏联对中国的各项援助及外交上的支持，对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具有不可抹杀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鉴于两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对抗的双重考虑，都产生了结盟的战略愿望。换言之，美国因素的存在，促使中苏两国克服隔阂，逐步走向友好，并努力建立起共同对抗美国的友好同盟关系。在这一前提下，1949年底，毛泽东乘专列去莫斯科，在为斯大林祝寿的同时，更重要的目的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中苏两国新的友好同盟关系的建立。它规定，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全面合作，明确了中苏双方的同盟关系。

它还规定，缔约双方不得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或集团，缔约一方如受到第二国的侵略，另一方将立即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它大大增加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使美国的“楔子战略”在出台之初就遭受了巨大挫折。因为十分明显，中苏同盟条约所针对的是美国。正如美国学者维斯塔所说，中苏友谊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种反美联合，或者说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反资本主义制度的联合，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出现，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除了苏联以外，中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的确立，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一方面，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中国可以利用与东欧国家的贸易补充与西方贸易的不足，另一方面，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



新政协筹备会议

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主席多年来的一贯主张，发表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2月，毛主席在对中共中央会议的报告中，再度重申这个纲领。毛主席的这个文告，使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为后来各党各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奠定了基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并且提出了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同时，中共中央还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商讨有关问题。随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发表通电与声明，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应中共中央的邀请，8、9月间，各民主党派一些有代表性人士，分别陆续抵达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和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

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受命主管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新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周建人等商讨，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并报送中共中央。文件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新政协召集问题；新政协参加者；新政协时间、地点；新政协讨论等事项。10月初，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组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任部长，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10月至11月，中共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发给中共东北局，请他们向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7人征询意见，进行广泛的协商。随后，中共中央又征求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何香

凝、周新民、马叙伦等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的意见。同时再次邀请尚在香港、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1月25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人士，最后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4项协议：一、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之23个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二、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是：负责邀请各方代表人物参加新政协，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和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三、预拟新政协参加的单位共38个，每单位代表人数为6人。四、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和主要任务。这个协议，成为新政协召开的政治基础。

李维汉于1949年3月10日到达北平后，逐个走访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马叙伦、蔡廷锴等20多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向他们分析形势，介绍情况，阐明中共的方针政策，并回答所提出的问题。经过反复协商和交换意见，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从而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3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在六国饭店举行茶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他谈到关于新政协的问题时说：新政协要通过一个共同纲领，这个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各民族的联盟，这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毛主席说的民主集中制。经济政策是16个字，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文化教育政策就是要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要争取、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知识分子。此外，还要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共23个单位，134人参加。李维汉作为中共代表的成员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1人，宣告新政协筹备会的正式成立。当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会议还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分别设立6个小组，进行各项具体工作事宜。李维汉被推举为第一小组组长，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人数。提出参加新政协会议之单位及其各单位的代表名单，是一件非常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李



维汉为此花了大量精力，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对所有提名都进行逐个审查，广泛协商，调查研究，使代表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第一小组成立后，先后由各单位磋商，然后又拟出了一个草案，在第一次小组会上，全体组员一致通过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6月19日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其中决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为45个单位，代表总额510名。在筹备新政协工作期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成由21人参加的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由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5人组成干事会常委，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4人，被分工负责党派工作。

8月18日，李维汉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发言，指出：“新政协任务重大，筹备会规定了参加单位45个，另设一特邀单位，范围很广泛，这是由于：一、此次会议是首届会议，是一个历史的总结的会议，故其范围包括一切参加奋斗的方面，直到最后对地方性的和平解放有贡献者均包括在内；二、这次会议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要制定宪法性的纲领与组织法。由于整个革命战争的发展具备了今天的条件，在去年的情况下，召集像今天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是较困难的。今天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开这个包括各方面、各地区，范围很广的会议，这是根据政治环境的发展和需要来决定的。”他还说：“按照新政协的章程不能有反动分子参加此为一原则性的界限，必须严格尊重。我们在工作中也极力主张此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新政协筹备工作，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圆满结束，最终确定了662位代表的名单。这份政协代表名单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一届政协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1948年4月，毛泽东在进入河北后，暂住阜平县城南庄，于25日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到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简称城南庄会议），提出会议的议题之一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27日，毛泽东又致信晋察冀城工部刘仁，说明他提出准备邀请各方代表在解放区召开的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城南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各民主党派立即纷纷响应，但是，在他们各自发表的宣言或声明中，却大多将“五一”口号提出的“政治协商会议”，径改称为“新政协”。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宣言提出：“我们不要把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词和过去的政协混淆了意义，旧的反动者的政协，已经因他们撕破而过去了，行将召开的‘新政协’，是完全由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临时代表商讨国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者，不会再让其幽灵复活，混进革命的阵营，更没有美帝国主义者阴谋魔手鬼祟出没的余地。”此外，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也一律采用了“新政协”或“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

毛泽东很快采纳了民主党派的意见。自6月以后，在他起草的文电中同样使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13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致上海、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电，请他们征询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等项意见。8月1日，他复电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并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自此，在会议筹备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

1949年8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组织法起草小组认为，“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政治区分不够明确。周恩来于是提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长期存在。周恩来这个建议，在9月17日召开的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从此，新政协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毛泽东最早在致刘仁的信中，曾提出准备于1948年秋季在哈尔滨召开。但是，当年9月，在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的电报中已改变最初计划，设想新政协召开时间大约是在1949年春季，提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运入解放区，方为合适”。一个月以后，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野战军林彪等人的电报，再次将新政协开会的时间略